

近代中國的翻譯語：嚴復的角色

黃 克武

從 1854 年 1 月 8 日 嚴復誕生，至今日的 150 年之間，中國經歷了曲折的近代化的歷程。在此過程中，嚴復的重要性不在政治或他所長期從事的海軍教育，而在於他對 19 世紀末葉以來，他透過以典雅古文翻譯政治、經濟、社會、哲學與進化理論等方面的西方經典，而對中國思想發展產生的影響。誠如哈佛大學 史華慈 教授所說，「嚴復的關懷一一是有意義的關懷，他因應這些關懷所做的努力，是有意義的努力」。

嚴復在近代思想家之中，是一位既寬廣、又具有深度的學者。然而他的思想有無發揮影響卻是另一個層面的問題。近年來嚴復思想深受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大陸學界的肯定，認為是「感覺敏銳」的一位科學、民主啟蒙的先驅者。從 1993 年到 2008 年開過多次的嚴復思想研討會，企圖汲取嚴復思想的時代意義。「嚴復崇拜」成為當代歷史的顯著現象。不過這些參與嚴復崇拜的學者，卻忽略了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亦即從嚴復晚年到 1980 年代，嚴復的形象其實是非常負面的，他所主張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相結合的建國方案與國共兩黨主流論述隔隔不入。

總之，嚴復思想究竟影響力有多大，或說到底發揮何種影響，仍有待釐清。本文嘗試從近代中國翻譯語彙之形成的角度，來討論嚴復在近代中國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在討論此一課題時首先要注意嚴復的歷史角色有一個悖論之處，亦即他的思想面影響大（尤其是《天演論》中的進化觀念），而他所用的文字（桐城古文）與所創造的詞彙，在二十世紀初期之後卻被胡適、陳獨秀所主張的白話文，與梁啟超等人，尤其大量留日學生所引進的「和製漢語」所徹底打敗。

如果嚴譯語彙難以存活，那麼嚴復在思想面的影響就的確值得再作斟酌。在八種最風行的嚴譯之中，真正有影響力的可能只有《天演論》。然而誠如賀麟所論，人們對《天演論》的理解，侷限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救亡感，而不是在生物學與哲學的學理面向。

嚴復所翻譯其他的書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部份：邏輯學、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說與自由主義的政治學說三個部份。

以邏輯學來說，嚴復的譯作最難為人所瞭解。包天笑的回憶錄有很精彩的一段，記載 1905 年《穆勒名學》剛出版，嚴復應金粟齋之邀在上海演講名學，「使得大家明白一點」。當時一班名流都來了，包括張元濟、鄭孝胥，也邀請了常來的馬君武、林白水、章士釗、章太炎等人。根據包天笑：「他的講詞中，常常夾雜了英文，不懂英文的人，便有些不大明白。但這種學問，到底是屬於深奧的學問，儘有許多人，即使聽了也莫名其妙」。在嚴復邏輯學翻譯語之中，除了「邏輯」一詞因為章士釗的大力推薦，

仍然存在之外，其他的譯語如：「珠聯」（三段論法）、內籀（歸納）、外籀（演繹）、「詞」（命題）、「玄名」（抽象名詞）、「察名」（具體名詞）全為日譯名所取代。

在經濟學方面，根據賴建誠《亞當斯密斯與嚴復》和吳建林的碩士論文〈論嚴復於《原富》內經濟類名詞之翻譯手法及其所譯名詞之消亡〉（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2004），嚴復的「計學」、「版克」不敵日譯的「經濟」、「銀行」，這是大家所熟知的。再者，他援引古典詞彙、喜用單音譯詞字，如以「鬪博」翻譯 lottery；「聯」來翻譯 corporation、「貨」來翻譯 commodity。此外，嚴復所用的大量音譯詞也被淘汰。其中一個原因或與是嚴復在音譯時刻意引用佛典而產生距離感，如他將 Royal Bank 翻譯為「賴耶版克」，自註「賴耶，本梵語，譯言王家」。賴耶源自「阿賴耶」，為梵語 alayavijnana（藏識）。其他的音譯語如「賴摩」（Lima，秘魯首都）、「毗勒」（bill）、「須彌」（Himalayas）等都有佛教語彙的意味。同時有些意譯語也有佛教、莊子的痕跡如 free trade 譯為「無遮通商」、fixed capital 譯為「常住母財」；South Sea Company 譯為「南溟有限公司」。

在自由主義方面拙著曾討論：嚴復不同意日人將 rights 譯為「權利」，他認為這是「以霸譯王」（無論「權宜」或「權謀」都具有負面的意義），將西方一個具有正面意義的詞翻譯為一個帶有負面意義的詞，因此另行譯為「職」或「直」，如「天直」、「民直」，因為他覺得 rights 在西文中也有直線、直角之意（right line 與 right angle），而中文的「直」也有「職」的意思，兩者相互配合。再者，在翻譯與 rights 相關的詞語時，他並不重複使用單一的辭彙來翻譯這個字，而常常依據上下文來作調整。例如他將 rights and interests 合併翻譯為「權利」；他有時又將 interests 翻譯為「權利」；他也把 “constituted rights” 翻譯為「權利」。根據筆者的考察，當彌爾所稱的 rights 是一種源於自然或不可讓渡之意時，嚴復傾向於翻譯為「天直」、「民直」；然而當 rights 與 interest 合用，而具有個人利益之意涵時，他則採用「權利」。眾所周知，「民直」一詞不敵「權利」，已被淘汰。

嚴復的失敗有一個過程，大致上是從 1901-1911 的十年之間所形成的。在 1903 年出版的《新爾雅》中其實仍包容了大量的嚴譯名詞。如在「釋名」一節，編者即同時羅列嚴復譯語和和製漢語。然而到了 1911 年上海國學扶輪社於出版的《普通百科新大辭典》時，情況卻有所改變。這一套書由黃人主編、嚴復為之作序，共 15 冊，全書「一百數十萬言」，收集詞條 11865 條，據統計其中僅 5500 條屬於社會科學方面，其他部分則為科學與技術方面的詞彙，全書依照筆畫排列，並附分科索引。

不少的學者都指出《普通百科新大辭典》所收錄新知識用語主要採取日本新名詞，並刊載大量日本所翻譯的地名和人名，這主要是因為編者所依賴的參考書籍大多數是日文書與日譯本。這一個觀察是正確的。那麼在這一套由嚴復作序的辭典中，嚴復的譯語究竟保留了多少？根據筆者的考察，編者絕大部分都採取日譯詞彙，而放棄嚴譯。例如書中收錄了「神經」、「星雲」、「單位」、「權利」、「銀行」、「望遠鏡」、「社會學」、「人類學」、「進化論」、「有機體」等等。「神經」之下附了早期的譯語「腦氣筋」，卻沒有嚴譯之「涅伏」。不過也有一些詞語附了嚴復譯語，例如，在「三段論法」之下附了「連珠」；在「人為淘汰」之下附了「擇種留良」；「論理學」之下附了「名學」；「經

濟學」之下附了「計學」。在書中所收錄的一萬多詞條中，嚴復譯語被採取作為主條目者僅有：「天擇物競」、「適者生存」、「內籀」（後附「歸納」）與「外籀」（後附「演繹」）。不過上述四個嚴譯條目中，「內籀」與「外籀」最後還是被日譯所取代，這樣一來《天演論》的「天擇物競」、「適者生存」是僅存的詞條。

嚴譯詞與為何失敗？根據學者的研究，這些原因可以歸納為以下數點：清末以來譯自日本的書刊數量太多，約定俗成之後，即難以抗拒；嚴譯「太務淵雅，刻意模仿先秦文體」，所以不易為人理解，而在五四白話文運動後很難受到人們的歡迎；嚴復翻譯好用單音詞（如計學、群學、心學），不敵「複合詞」（如經濟、社會、心理）在意義傳遞上的豐富性；嚴復喜用音譯；嚴復所負責譯名統一工作（他擔任學部之下的「編訂名詞館」總纂一職）遲遲無法有效推行等。

民國初年之後日譯名詞取得了絕對的勝利。今日少有華人會意識到「團體」、「組織」、「膨脹」、「舞臺」、「代表」等詞彙是從日文來的。《荀子》〈正名篇〉曾說：「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上文中所謂「約定俗成」大致上可以解釋日譯的成功。這尤其表現在這些新名詞在大眾傳播媒體（各種報刊）、翻譯書籍、教科書、百科辭典等出版品之中隨著新知識的傳播大量出現，發揮了撲天蓋地的影響力。相對來說，嚴復的翻譯作品只佔了出版市場之中很小的一塊，只好敗下陣來。不過，我們也不能忽略荀子還有「名有固善」的觀點。對他而言，語言文字的創造（包括名詞翻譯）仍存在一個絕對的標準，只不過「名」的好壞與其是否能「約定俗成」並無必然的關係。嚴復非常努力地創造「徑易而不拂」（簡單明瞭而又不矛盾）的「善名」。他很清楚地意識到譯名要有文字學的基礎，並奠定在譯者對翻譯雙方（所謂的主方語言與客方語言）文化背景的深刻認識之上，亦即一方面應上溯西文原字在希臘文或拉丁文中的原意，另一方面要尋找在中國文字學上有來歷的適當名詞來翻譯西字，並細查其兩方詞彙的文化與思想背景。嚴復所採取的音義並重的譯法，如以「烏託邦」翻譯 Utopia，以及以「民直」來譯 right，都是很好的例子。很可惜在各種因素影響下，嚴譯名詞未能更廣泛地為人們所採納，然而他所揭櫫的理想，無疑地值得我們繼續追求。